

# CSSCI 期刊評價功能異化的內在機理

李 頻

本短文的邏輯起點是 CSSCI 研製人員承認的期刊評價功能異化。既然異化，則假定異化有兩種可能：內在異化和外在異化。筆者就此贊成“把 CSSCI 本身的問題與 CSSCI 在接受和傳播過程中產生的問題嚴格區分開來”。由於已有不少論文討論過或旁涉過 CSSCI 在接受和傳播過程中產生的問題，故本文試圖聚焦於 CSSCI 本身的問題。王文軍先生承認，CSSCI 存在“由於引文索引自身的設計原理帶來的先天性問題”（參見王文軍：《檢索抑或評價：CSSCI 功能論析》，《澳門理工學報》2013 年第 2 期），那麼，CSSCI 期刊評價功能異化是否與此相關呢？筆者外行於文獻計量學，斗膽撰寫此文，將拜讀同行論文的兩點體會、疑惑奉獻於方家，敬請指正。

## 一、文獻之間的本質聯繫是什麼，該是什麼

所謂學術（academia）是指專門系統的學問，然而，它的原初含義指的是“知識的積累”；而所謂學術研究主要是指根據已有的知識積累，不斷推進對現有問題、知識和理論的研究，實現知識的傳承和理論的創新。其最直接體現之一就是引證文獻和被引證文獻之間的內在關係：它表明了文獻之間的繼承和發展關係，反映了學科的發展軌跡和傳承情況，從而使不同時期科學家的研究成果能夠形成有機的脈絡。而引文索引（Citation Index）就是一種以文獻之間的這種內在聯繫為基礎的檢索工具。

引文索引反映了科學文獻之間相互引證的關係和特點，通過分析科學文獻之間的引用和被引用情況，可以揭示其數量特徵和內在規律，從而發現科學文獻之間的縱向繼承與橫向聯繫的形態，進而評估學科研究的發展規模和趨勢。（王文軍：《檢索抑或評價：CSSCI 功能論析》）

文軍先生是在“CSSCI 的建設初衷與設計原理”節題下做此陳述的。惟其如此，才值得倍加關注。筆者注意到，同為文獻計量學學人，他與任全娥博士對學術的理解大同而小異。任全娥曾撰文指出：要理解學術論文的概念，需要首先明確“學術”的概念。“學術乃是人類對社會及自然界理性思考與認知的科學結晶，是對客觀規律的把握與應用。可見，學術論文的基本特點是其科學性與真理性，形式特點是以學術期刊作為學術思想交流與傳播載體。優質的人文社會科學學術論文成果，應當是採用真實文獻資料與科學研究方法得到的、具有社會價值或人文意義的人類社會及其發展規律的客觀知識產出形式。因此，人文社會科學研究成果，既要有‘科學’的形式，又要有‘社會’價值或‘人文’意義，不但要‘社會化’，還要‘科學化’。”（任全娥：《學術論文評價方法研究》，《澳門理工學報》2014 年第 4 期）按照任博士的主張，“人文社會科學研究成果”不但要有“科學”的形式，還應兼有社會價值或人文意義。她所說的社會價值和人文意義，顯然不僅指作為研究成果的文獻形式本身，更指文獻所承載的知識和思想以及它與社會語境的生產與傳播關聯。

文軍先生話語中最值得討教的有兩點：其一，“引證文獻與被引證文獻之間的內在關係”到底是什麼？其二，引文分析的分析對象是什麼？該是什麼？引證文獻與被引證文獻以題名、作者、文獻源等外在形態所記錄並“物化”了其間關係，這顯然只是表面化的，真正表達“引證文獻和被引證文獻之間內在關係”的是文獻之間以話語形式表達出來的知識和思想，只有文獻之間的知識和思想才真正內在地表明了文軍先生所說的“文獻之間的繼承和發展關係”，“反映了學科的發展軌跡和傳承情況，從而使不同時期科學家的研究成果能夠形成有機的脈絡”。筆者無意否定王文軍先生的定義，對相同對象不同學科有不同定義乃人類常見多見的知識現象，主張同一對象的不同概念辨析是想在知識社會學層面清理期刊評價雙方爭議和分歧的由來。筆者主張並希望文獻計量學專家認同，文獻之間的“物化”聯繫、文獻之間的知識和思想聯繫是兩個概念，文獻之間的知識和思想聯繫才是文獻之間內在的、本質性聯繫；文獻之間聯繫是目前文獻計量學界開展學術評價、學術期刊評價的“實然”基礎，其“應然”基礎是文獻之間的知識與思想聯繫。

目前文獻計量學界懸置文獻之間的知識與思想關聯，專注文獻外在的物理表徵“從而發現科學文獻之間的縱向繼承和橫向聯繫的形態”，由於知識和思想描述分析缺席，揭示的縱向繼承和橫向聯繫僅僅是外在形態上的，如從文獻發佈時間推斷縱向繼承，從文獻源的出版地域、標引的學科領域推斷橫向聯繫，這樣的縱橫聯繫揭示是有限的、有條件的、未必充分可靠的。說借此“可以揭示其數量特徵和內在規律”，只要數據庫達到一定規模，揭示其數量特徵沒問題，所揭示的內在規律則看如何界定，如果指已刊文獻的傳播規律，在不完全引證和不完全統計的前提下可以基本認同為以不完全歸納推理為思維形式的規律。如果說揭示了文獻之間的知識和思想衍生、演變規律，那是不可能的，因為其建設初衷中就沒有納入知識和思想的維度。

創新是學術界、期刊界的共識，歷代學人、學術期刊人孜孜以求知識和思想的創新，通過解釋、解決歷史及現實中的理論和實踐問題來推進知識的更新和增長。CSSCI 懸置或忽略引文分析中的知識和思想聯繫或許就是期刊評價方和被評價方分歧及爭議的根源。如果文獻之間“物化”聯繫、文獻之間知識和思想聯繫的辨析與區分有助於理解、解釋當前期刊評價中的爭議和分歧，那麼化解爭議與分歧的關鍵是否就在於 CSSCI 從文獻的“物化”描述分析突破到文獻內在的知識和思想描述分析。既然學術和學術期刊都以思想創新知識更新作為全社會的起始動力和終極目標，針對學術和學術期刊的評價忽視、忽略了思想創新和知識更新也就缺失了存在前提。分析對象和分析方法統一基本學術倫理，文獻計量學界有必要在協同創新的理念上進行反思，在研究方法、分析工具的選擇、組合上進一步打磨。

## 二、“深作為”與“淺作為”的矛盾所折射的學科理性猶疑

這裡所說的“淺作為”是指“目前 CSSCI 主要是按一級學科分類來篩選來源期刊，這一方式導致一些二級學科、新興學科、交叉學科、邊緣學科和專深領域的期刊無法有效地收錄進來。”（王文軍：《檢索抑或評價：CSSCI 功能論析》）。文軍先生將此視為“CSSCI 發展中遇到的問題”之一，不知後來改進情況如何。其關聯和影響是結構性的，最值得關注。

這裡所說的“深作為”是指，自 2006 年以來，CSSCI 收錄了為數不少的學術集刊（參見葉繼元：《學術集刊的性能及其評價》，《澳門理工學報》2013 年第 4 期）。這些集刊以書號而不是刊號出版，政府不認可它為期刊，CSSCI 參照國際慣例認可其為連續出版物予以分析評價。這批集刊質量良莠不齊，其中高質量集刊反映了一批學人突破期刊審批瓶頸、深耕學術、建設學科

的主體追求。筆者因此欽佩主事者膽識，並因而開始關注 CSSCI，祈願它激勵學術集刊倒逼全國高校人文社科綜合性學報改革。惜後來不見更大動靜，原由欠詳。

是否存在以及如何解釋 CSSCI 中“深作為”與“淺作為”的矛盾？筆者傾向於推斷 CSSCI 行為理念尚不清晰明確，對納入分析的學術集刊和沒納入分析的新興學科、交叉學科等期刊的學術與學科本質意義認知不夠明晰。

學科是人類認識自然和社會的知識體系，學術共同體開展各種學術活動的終極目標是建設學科。學科是目的，相比而言，學術只是手段，包括學術期刊編輯出版在內的學術傳播活動都只是服從服務於學術共同體學科建設目標的手段。CSSCI 棄取某類別期刊不是簡單的期刊選擇行為，行為背後是價值理性。其行為意義在於學科意義，學科導向與引領意識，不有效收錄新興學科、交叉學科、邊緣學科期刊表明，CSSCI 缺失本該有的學科導向自覺。如果缺乏學科建設、學科導向的邏輯前提，學術界、學術期刊界的有識之士難以公開支持 CSSCI 的期刊評價。

依據已有的對期刊評價的“討伐”文獻，筆者傾向於推斷包括 CSSCI 在內的期刊評價對當下人文社科學術期刊生態乃至未來一定時段的人文社科學術生態產生了一定程度的消極甚至負面影響。不過這些消極或負面影響沒有實證，或某些實證性研究成果沒有細心、有效解讀其消極意義而已。“也有的期刊編輯有意無意地、也可能是無奈地減少被引頻次低的學科論文的發文率（年度學科論文數佔年度總發文數的比重），增加被引頻次高的學科論文的發文率。有的期刊編輯很無奈地減少文史類論文的發文量。在 CSSCI 收錄的高校文科綜合性學報中，2007 年刊載的宗教學和馬克思主義學科論文的發文率僅為 2000 年的 84% 和 58%，而法學和管理學則為 137% 和 129%；在 CSSCI 收錄的社科綜合性期刊中，2007 年刊載的宗教學和馬克思主義學科論文的發文率僅為 2000 年的 77% 和 74%，而法學和圖書館、情報與文獻學則為 202% 和 139%。在 2000—2009 年 CSSCI 的所有收錄論文中，馬克思主義學科的發文率 2009 年只有 2000 年的 69%，政治學和考古學論文的發文率 2009 年為 2000 年的 83% 左右；法學、體育學和民族學論的發文率 2009 年為 2000 年的 128%—130%。”（袁培國：《中文文科期刊影響因子評價作用之反思》，《南京大學學報》2011 年第 3 期）文獻的消長乃至學科的興衰誠然是多種社會因素複合作用的結果，它如果不是由社會發展引致的學科發展的真實需求決定，而是某種扭曲的需求假像所引領，那是學術界應該警惕的。如果被引頻次作為指揮棒或者說隱形指揮棒對所發表論文的學科結構產生了強力影響，則是值得學術界密切關注與 CSSCI 深思的。

儘管 CSSCI 的期刊評價對學術期刊編輯產生了一定的消極作用，但不能因此否定它作為檢索工具和分析工具的期刊認識價值。文軍先生在一篇文章中揭示，《新華文摘》、《中國社會科學文摘》、《高校文科學術文摘》“並沒有預想中所應該具有的遠高於原發期刊的影響因子，不僅遠低於《中國社會科學》，而且僅與《中國人民大學學報》、《開放時代》等大體相當；同時還發現，被三大文摘摘編的論文並不比發表在同原發期刊上的其他論文擁有更好的被引率”。（王文軍：《中國學術文摘：現狀與展望——以“三大文摘”為中心的實證研究》，《清華大學學報》2013 年第 6 期）這一研究實證了以“三大文摘”期刊評價學術期刊的非理性，如果離開 CSSCI 自身強大數據庫支持，很難做出如此精細的分析。它展示了基於大數據對學術研究和學術期刊研究的可能性乃至某種可以嚮往的願景。它還嚴肅地提示學術期刊界，當此中國從工業社會快速躍遷到信息社會的轉型階段，自身也要觀念更新。某種在工業文明時代確信的知識如果在信息時代繼續確信則極有可能被其他人認為是“無知”。在工業文明時代，信息流動以出版物物流為依託，

沒有物流人流便沒有信息流，因而文摘期刊比文摘來源期刊因信息廣度、密度、純度而具有更高的傳播效率。在信息時代，信息流與物流分離，期刊上的學術論文掙脫期刊而成為獨立的傳播單位，而作為論文“傳播母體”的學術期刊則弱化、虛擬化。這種物流與信息流的分離，論文脫離期刊而在數據庫中獨立傳播是信息時代學術傳播的基本特徵，也是認定在信息時代依然以“三大文摘”期刊評價學術期刊為非理性的理性依據。該研究如果能在公開相關數據的前提下“以文評文”爾後“以文評刊”，以個案來解釋《中國社會科學》、《中國人民大學學報》、《開放時代》具有更高學術影響力的內在機理，那是值得翹首以盼的。

期刊業 30 多年來的最大痼疾是審批制主導下的期刊結構不適應社會文化發展的需要，政治理性滯後、政府治理懈怠導致期刊結構調整長期停留於文件或領導講話。互聯網傳播、移動傳播的迅猛發展替代性滿足了社會對大眾期刊的需求，因而同步終結了對大眾期刊結構調整的需求。學術期刊的需求依然旺盛（未必僅僅因為職稱評定的制度安排，絕不能排除信息高度發達後對高品質學術和高解釋力理論知識的更旺盛需求），因而學術期刊的結構調整難題依然存在，依然困擾著至少兩三代學術期刊人、三四代學術人。這種體制性、世紀性的學術期刊結構難題從另一方面說，恰恰是南京大學中國社會科學研究評價中心這樣擁有較強大信息技術力量的非政府組織的行動空間。如果 CSSCI 能在中國社會科學的宏闊視野層面完成學科建設理性自覺與相應擔當，從而有效打磨研究工具，更充分釋放其基於大數據的分析工具潛力，對中國人文社會科學學科趨勢預判、學科結構調整將產生積極而深刻的影響。

從學術期刊服務學術、並以學科建設為目標的理念出發，理想的學術期刊結構應該是依託學科結構的衍生結構，因而學術期刊結構調整的動力應該內生於學術界學科建設的需要，而免於學術界以外的外生力量的干擾牽制。CSSCI 如果能科學有效地“評估學科研究的發展規模與趨勢”，它所描繪的當下和未來的結構性知識圖譜就可能成為學術界調整學科結構、學術期刊界調整學術期刊結構的決策依據，那將是普惠學界的福音。

在分析“信息時代三大文摘面臨的社會傳播新挑戰”時，文軍先生說，“學術共同體原有的中心—邊緣關係被打破了，共同體成員之間的關係變得更加平等、更加民主，因此人們不再認同和接受過去那種不平等的等級制關係，要求並在事實上已經初步建構出一種新型的關係模型。（參見王文軍：《中國學術文摘：現狀與展望——以“三大文摘”為中心的實證研究》）以其中平等、民主理念審視學術期刊現狀以及 CSSCI 的期刊評價，人們或許會提出如下一些問題：CSSCI 是否以某種未必為學術共同體“同意”的專業方式主導了期刊關係重構？其重構的是否另一形態的中心—邊緣關係、不平等關係？重構過程及結果是否會存在“逆民主化”的可能性？這種 CSSCI 所重構的期刊關係，是否有可能導致對學術期刊結構板結的負面強化，進而傳導到人文社科學科結構？如何規避上述種種潛在的負面效應才是筆者深以為慮的。

學術期刊結構、學科結構問題屬於“多因一果”，誠然不該過多追責 CSSCI，惟其如此，學術共同體當深思慎取。中國科技期刊 30 多年的發展，已鑄成令多少科技工作者難以下嚥的科學傳播之痛，社科學界刊界應避免重蹈覆轍。

祝願 CSSCI 能夠早日順暢地“實現向數據開發和知識服務的轉移”，更好地發揮 CSSCI 對中國學術的積極作用。

（作者係中國傳媒大學編輯出版研究中心常務副主任，教授，博士生導師）

[責任編輯 劉澤生]